

公仲 汪义生 著

台湾新文学史初编



台湾新文学史初编
公仲 汪义生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字数31万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4.50元
ISBN 7-210-00379-7/I·164

序《台湾新文学史初编》

八一年，我在序《台湾诗选》（二）中写过：“美应该是完整的——浑圆象一个苹果，”“残缺不全是遗憾。”中国新文学史，没有台湾，怎能算完整？怎不觉遗憾？

如今，公仲、义生写出了一本台湾新文学史，虽说初编，却已是那样完整、颇多独立见解的史书。书中论述了台湾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台湾新文学发展的概况。

宁要观点新颖，个性独特，也不要人云亦云，东拼西凑。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也许不一定都会完全赞同书中所有论述，但可以切磋、研讨，增进了解，加强交流。这本书算开一个先例。

我对台湾，一往情深，常在念中。我常对人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去台湾看看。那里有我的老朋友，也有近几年在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地结识的台湾文学界新朋友。我借这本台湾新文学史书出版的机会，向远方的朋友致以良好祝愿。

林语堂
1988年7月2日

前　　言

海峡两岸，一水相隔，文学情思，一脉相通。38年的阻隔，使彼此略感陌生；5000年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贯通，又让我们倍觉亲切。考察海峡两岸新文学的异同及其发展趋向，就可以从这“通”与“隔”的历史渊薮出发。通则有同，隔则存异，然而由于地域之别，历史之变，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们要善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以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光我中华文学之业绩。

两岸新文学同者表现在我们都是一向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写实主义手法和风格，真实地反映时代现实生活，同情人民疾苦，针砭社会时弊，反对外来侵略，表现和歌颂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至现代的“五四”、“三十年代”，以至当代文学，无不具有这一优秀文学传统的特点。“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在当代台湾文学中，“作家所表现的主流乃是反映时代社会的现实，因此，台湾小说的社会性很浓”，“即使如积极主张吸收欧美现代文学精华的《文学杂志》或现代文学的作家也不例外。特别是《现代文学》派的翹首白先勇和陈若曦等作家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只不过他们在写实主义手法里导入了心理的、潜意识的、色彩的、音乐的现代感觉显著而已”（叶石涛语）。

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中，有“中庸”之道，有“无为”之道，有消极遁世，有悲观厌世，然而，支撑着中华民族文化，使之长盛不衰的精神支柱，仍是那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积极入世，

勇于革新的思想力量。“文以载道”、“命意在于匡世”是两岸大多数严肃的作家的文学主张，而两岸大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正是实践了这一文学主张，才得以传世。屈原、杜甫、白居易、关汉卿是如此，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是如此，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也是如此。

70年代后半期以来，两岸当代文学都进入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促动二者产生转机的背景不同，在台湾是因恶性西化，走火入魔而引发一场乡土文学论争；在大陆则是极左路线统治的终止，向着开放世界的突破。从表象上看，二者呈逆反走向：一个强调回归，重认传统；一个主张开放，面向现代。而实质上，却是在一个追求中华民族文学的新精神、新风格、新水平的更高的文学层面上的同向靠拢。背离者回归，闭锁者开放。作家们借助现代艺术感知和把握方式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吸收现代观念，确立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又逐步向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加以深掘。这将可能形成一股向世界文学高峰奋勇攀登的势头；无疑是两岸作家的共同心愿和决心。

大陆当代文学，自刘心武的《班主任》问世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主潮的演进变化，可以看到时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三支文学队伍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主力军。老“五七”（即五七年被整错而下放的）为骨干（如王蒙、陆文夫、张贤亮、张弦、邓友梅、高晓声、白桦等），新“五七”为先锋（“文革”中下放的知青，如孔捷生、梁晓声、王安忆、张抗抗等），女作家群为突出代表（老一辈有冰心、丁玲，中年有茹志鹃、宗璞、谌容、张洁，青年有张辛欣、铁凝等）。他们高举现实主义大旗，贴近时代，反映现实，与广大人民群众心连着心，因而获得广大人民的特别喜爱和欢迎。

台湾当代文学，也是高举写实主义旗帜。涌现出一大批关心人民疾苦，注目改革进步，表现人生和社会理想的优秀作家、作

品。如陈映真、王拓、杨青矗、黄春明、王祯和、宋泽莱、黄凡等一批中青年作家，以及如《将军族》、《选举名册》、《麋城之丧》、《赖索》等作品。

当今台湾作家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已更多地从政治的视角逐渐转向人性的开掘。如《山路》、《铃铛花》、《渴死者》、《喝尿者》、《告密者》、《叛国》、《废墟台湾》、《牛肚港的故事》、《家》、《画像里的祝福》等，大多避免了观点直露的弊病，而着重对人性的内蕴进行挖掘，使作品的为民的忧患意识得到深化和拓展。

至于台湾50年代那种“反共文学”，大陆70年代的“瞒、骗文学”，早已被人们所唾弃，不值一提了。

在艺术方面，主要是对西方的借鉴，台湾六七十年代从现代派的兴起，到回归乡土，绕了一个小圈圈，近几年，大陆也绕圈圈。尽管其成因有别，而且还有个时间差，然而大家的经验都证明，全盘西化不足取，只有根植于自己祖国民族的土壤之中，也不拒绝一切西方可取的文学经验与方法，我们的民族文学才能得以发展、进步。

60年代的台湾，随着西方经济和商品的大量涌入，西方的文化和文学思潮也泛滥起来。加之与祖国大陆母体文化的切断，50年代的“反共八股”的令人反感而生厌，文学于是就难免倒向了西方现代主义。当然不应该否定60年代台湾现代派文学历史价值和文学成就。它不仅是一种对于50年代“反共文学”的反叛，而且在丰富和扩展台湾文学艺术技巧和表现形式方面，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对人性的挖掘，人物内心主观世界的开拓和对封闭结构的突破。

然而毋庸讳言，某些现代主义作家作品，脱离台湾现实生活土壤，把西方许多消极、颓废、苦闷、孤独、精神分裂的思想内容大量引进过来。某些作家，特别是新诗界的，将西方的“唯艺术

而艺术”“艺术至上”的文学观点捧为至宝，他们完全否定传统，只谈横的移植，单纯追求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艰深晦涩的语言和离奇古怪的形式，这些自然会遭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的。

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崛起，正好是对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总结。台湾《联合报》说：“经过彻底否定和破坏旧的文学传统，全盘西化向西方学习，思想和技巧一律学习的激进过程后，痛定思痛，我们已经认清了丧失自尊的可悲，重新捍卫民族文学的大旗，向传统归宗。”“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源远流长，我们更应该站在振兴文学的立场，向传统归宗，进一步丰富我们的文学传统。”我们认为这一席话是精当、中肯的。

大陆在70年代末期以后，文坛出现了一股西方现代主义的热潮，而且也是首先在新诗界兴起。“朦胧诗”问世，诗坛“三个崛起”的讨论，以及《文艺报》有关现代主义的争鸣，这是初潮。继而有小说“意识流”、和王蒙、李陀等作品的研究，还有戏剧京、海派之争，高行健小说技巧谈和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的讨论，近几年更有文学理论研究新方法的辩论，随之出现“新方法”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刘索拉、徐星、何立伟相继走红，王蒙不甘示弱，也《来劲》起来；评论界更是热闹异常，新星如走马灯，各领风骚三五天。时至今日，这个圈圈，开始往回转了。寻“根”热又仿佛想拉向另一个极端，阿城的禅宗，出世之道，飘洋过海，似成了正宗。看来，大陆某些人的圈圈也未转够呢。我们认为，台湾前车之鉴是值得重视和认真记取的。在当前大陆的改革、开放形势下，各式各样西方文化的充斥、冲击是难以避免的，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跟着瞎转圈也是会出现的。只是我们必须保持既开明又清醒的头脑，传统精华要发扬，封闭保守应破除，外来经验当吸收，生搬硬套不可取。

在语言方面，两岸文学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写作传统，都是采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话为基础方

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统一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白话文运动，对于海峡两岸汉语系文学语言的口语化、生活化，大众化，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台湾还有台湾话文的讨论，尽管各持一端，不无偏激，但汉文白话文写作传统并未否定。后来，日本侵略者施行奴化教育，禁止使用汉文，强行在学校推广日语，汉文白话写作传统就面临危机。可爱国的台湾作家，仍暗地里坚持汉文白话写作。光复以后，大量老、中年作家更刻苦努力，重新学习汉语，逐步锻炼用汉语白话文写作。现在，台湾老中青作家们掌握汉语白话文已经十分娴熟自如，与大陆作家并无二致了。

中国当代文学，大陆出现了像老舍、赵树理、孙犁等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语言大师，台湾也有张我军、林海音、梁实秋、谢冰莹等现代汉语精深的名家。在中青年作家中，大陆有邓友梅、苏叔阳的语言的京味、陆文夫的苏腔，古华、叶蔚林的湘南湘西的乡韵以及贾平凹的陕南商洛的土风。台湾乡土文学作家更吸取了闽南、客家地方方言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丰富了普通话。从郭秋生的台湾话文尝试到王祯和、廖雷夫的古语加方言实践，虽不尽成熟然增强了汉语言的表现力。而深得红楼三昧的白先勇、文情并茂的散文家许达然等，他们在现代汉语言运用、创新方面，建树颇多，值得研究。

两岸文学的异者则是大陆文学更注意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强调作品的社会意识、教育功能，关心作品的社会效果。当然，现在多数人也主张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融合统一。台湾文学则更多的是从作家的自我感受、感情出发，注重审美意识，甚至有人蔑视社会功能，不过不少乡土作家则反其道而行之。

“五四”以来，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一次全民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灾难深重的人民，深切感到，自身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的作家，就更义不容辞地要担负起国家、民族、社会的历史使命和重

大责任。注重作品的社会意识、教育功能，关心作品的社会效果，是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学的必然要求，是大陆文学的一大特点。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教育原则的过分影响，加之，“左”倾思潮时而泛滥，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文学的社会意识与教育功能有时就被强调到一种绝对的地步，以致与审美意识对立起来。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不少，教条主义突出，图解一时政策，作单纯的政治传声筒的作品有时颇为盛行，这就大大影响了大陆当代文学的质量和声誉。新时期10年以来，这类现象已明显地被克服，社会意识与审美意识融合一体的佳作，愈来愈多，在海内外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这是令人可喜的。如长篇《李自成》、《黄河东流去》、《芙蓉镇》，中篇《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短篇《陈奂生上城》、《剪辑错了的故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台湾5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的封闭，文化的断裂，使人们感到“客观的世界已经支离破碎，唯一可以肯定的，可能就是主观世界”。（叶维廉语）加之，6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的充斥，使作家们更多地从自我感受、感情出发从事写作，以抒发内心的苦闷、孤独、彷徨、不安。怀乡恋土、儿女情长是文学的主题，伤感、忧患是文学的基调。作家普遍注意审美意识，刻意求工，精心制作，然不少人却忘却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关在个人小家庭里玩文字游戏借以消愁。70年代乡土文学的复兴，反映现实，关心人生，表现理想的社会意识很强的乡土作品大量涌现，台湾文学的面貌大为改观。然也有些不大注重审美意识、艺术上较粗糙的作品出现，这是台湾乡土作家值得引以为戒的。

在题材开拓方面，大陆文学似乎视野更开阔，作品生活覆盖面更广更全，而台湾文学作品，一般而言题材狭窄，多囿于家庭生活琐事。大陆文学在五六十年代，题材基本上就是两大类：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70年代“文革”期间就搞得更

死，只剩 8 个样板戏，没有了作家，也无所谓题材了。直到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拨乱反正，突破禁区，实行开放，文学题材空前开阔，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都落入了作家的视野。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知青文学（知识青年下放生活）、大墙文学（监狱生活）、军事题材、改革题材，揭露党政部门官僚主义的，都有重大的突破，甚至描写男女婚恋，专写性心理的，几成热潮。这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台湾作家一般的由于社会意识群体意识较淡漠，社会活动范围和生活接触面有限，更多地局限在个人家庭之中，因而题材范围较窄，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影响也较小。不过，80 年代似有改观。如陈映真的《铃铛花》等两岸情结小说，吴锦发的《叛国》等反思小说，王拓、施明正的牢狱小说，杨青矗的《选举名册》等人权小说，有所突破，还有发展趋势。乡土文学也不单表现台湾农村故土，而进一步扩展至城镇，诸如生态平衡的现实问题，宋泽莱的《废墟台湾》等已用科学幻想形式，反映出来了。台湾文学的题材必将一天天拓宽扩大。

大陆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比较强，切合形势，宣传政策，歌颂先进人物，而台湾文学商品化现象严重，严肃文学受到冲击和干扰。文学贴近现实，服务于宣传、歌颂，往往是某些搞纯文学作家所耻于言谈的，然而，我们认为，在现时代，文学却难免要负有宣传教育的使命，不必隐讳，也不必以为不光彩。至于那种急功近利，媚上欺下，为一己之得而说假话，出卖灵魂的御用文人，又当别论。我们还以为，在商品社会中、文学的商品价值也不容否定，甚至文学作商品广告，促进商品经济流通发展，也算一件好事，不必将文学功能人为地缩小，贬低，自轻自贱，而另一方面，又把自己装扮得那么圣洁干净，成为超凡脱俗的精神贵族。我们倒赞成张系国对自己的《棋王》中那群失落于功利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同情多于谴责。当然，文学掉进钱眼，成了商品的

附庸，金钱的奴隶，那是文学的没落，又当别论了。

在作家的文化素质方面，大陆非学者化现象较重，作家主要得益于生活的丰厚，作品以生活的广度和思想内容的深度取胜。而台湾作家学者化程度较高，大多读了大学，留过学，他们得益于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功底，他们以精美的技巧和优美的语言见称。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代大陆中青年作家，无论老“五七”或新“五七”战士，大都有着一段坎坷的生活经历，自觉或不自觉地排除了接受系统的高等甚至于中等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一般而言，他们的外语水平和古典文学修养较差，自然科学知识更为单薄。如像老一辈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钱钟书等既是作家，又是学者的很少。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大多都是从生活的最底层走过来的，饱经沧桑，生活积累与感受极丰，再加之，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的教育熏陶，所以他们一旦得到机遇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就能显示出其生活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敏锐性。而台湾中青年一代作家，无论是从大陆移居的还是本土生长的，尽管各自生活环境家庭条件不同，但读书似乎是唯一出路，大学、留洋似乎是必经之途。所以他们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功底，一般都较厚实，不少人就是各种专业学科的学者。如张系国、非马等竟是电脑、核动力专家。他们作品一般学院派架式、书卷味较浓，特别是现代派作家们。然成绩卓著如白先勇陈若曦等，他们还是有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与特殊的感受的。作家学者化，有利也有弊，不能一味强求。生活毕竟是文学的源泉，作家都化为学者，文学就将有枯竭之虞。

当代大陆作家，得天独厚，大都职业化，有固定工资和安稳生活条件。稿酬纯为额外收入，有时间于长篇巨制。故文学作品有愈来愈长的趋向。但如不珍惜这世上少有的优越条件，加强作

家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则有可能逐渐脱离人民群众，成为只会玩弄些消遣文学的精神贵族。而台湾作家大都是业余创作，靠稿费以为生。必须另谋职业，或教书或做职员，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在比较紧张、艰难的条件下从事创作，以短为主。正因为如此，不承担在外谋生义务的大量家庭妇女，却得机脱颖而出。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大多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又凭借女性的细腻情感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因而在台湾文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女作家群的兴起，是海峡两岸共同的特征，可大陆女作家，却是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独立自主而占据文坛的。他们的作品，虽也有大量爱情、婚姻、家庭的题材，但从表现的角度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深度来看，与台湾女作家的软性作品，迥然有异。在大陆，从作品中是难看出哪篇是出自女性的手笔的。

在借鉴西方技巧方法方面，大陆作家热了一阵，然模仿居多，生搬硬套不少，尚未能与民族传统手法有机结合。而台湾作家已经过一段摸索，现有不少作家运用娴熟，能与民族传统手法有机结合，将西方的表现手法溶入传统。像白先勇作为现代派作家，却是以中国传统手法为基本表现手段，又揉进大量西方现代主义的时空交错、象征、暗示，意识流等，不动声色，不露痕迹，使作品容量加大，更显得丰富多姿，很可供大陆借鉴、学习。

在海峡两岸当代文学异同的分析比较之中，其今后发展的趋向已见端倪。随着当前世界日趋谅解、缓和，两岸学术交流日益增加，必将出现一个相互借鉴、学习，共同携手并进，齐攀世界文学高峰的新趋向。

两岸文学将在关心社会，面向人生，憧憬未来的时代主潮中得到汇合，将在为祖国为人民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忏悔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熔铸中得到净化、提高，将势必把对美学原则的思考，艺术技巧的运用和文学语言的锤炼提到议事日程。我们的文学再不满足于小家子气，小打小闹，在呼唤着一代史诗，在造就

着当代大师。我们的目光，不只是盯着诺贝尔文学奖金，而是世界文学的峰巅。历史所赋予中国文学的无与伦比的辉煌业绩，定将在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奋斗之中，发扬光大。

目 录

- 序《台湾新文学史初编》……………艾青（1）
前 言…………… （1）

上编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1920—1945）

第一章 台湾新文学的孕育期(五四运动前后)……………（3）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台湾文学的影响
——应声会、新民会等新文化运动协会的成立和
《台湾青年》、《台湾民报》创刊——早期的新文学作品

第二章 台湾新文学的摇篮期(1923—1926)……………（8）

新旧文学的论争——“清道夫”张我军——新文学之奠基人赖和——杨云萍的尝试

第三章 台湾新文学的成熟期(1926—1937)……………（19）

台湾文艺联盟等文学团体成立——《台湾文艺》等文学杂志创刊——不朽的老兵杨逵——乡土派的文学观——小说和诗歌的实绩

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台湾文学(1937—1945)..... (39)

新文学受挫——扑不灭的抗日文学——“铁血文人”

吴浊流——“皇民文学”

下编 当代台湾文学

(1945—1988)

第一章 光复期的台湾文学(1945—1949)..... (63)

沉寂的文坛过渡时期——作家的新探索——“乡土文学之父”钟理和

第二章 五十年代前期的台湾文学(1949—1956)..... (73)

反共八股泛滥——“战斗文艺”口号及“军中三剑客”
——女作家跻身于文坛——钟理和的呕心沥血之作

第三章 五十年代后期及六十年代台湾文学(上)

(1956—1966)..... (82)

林海音、孟瑶的怀乡思亲小说——继往开来的钟肇政——现代派崛起的背景——“现代派”、“蓝星”、“创世纪”、“笠”等诗社及诗刊——台大“学院派”——关于现代诗的两次论争——现代派文学的特征——纪弦、覃子豪、余光中、郑愁予、洛夫、方思、白萩等现代派的诗——痖弦、商禽、罗门、周梦蝶等军旅诗人的诗——女诗人蓉子的诗

第四章 五十年代后期及六十年代台湾文学(下)

(1956—1966) (140)

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现代派的小说
——聂华苓的早期小说——梁实秋、柏杨、张秀亚、
琦君、王鼎钧、谢冰莹、萧白、郭枫等的散文——
新戏剧的发展——李曼瑰的历史剧——电影文学的
起步

第五章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台湾文学(上)

(1966—1980) (179)

“回归乡土”口号的提出及现代派和乡土派两次论争
——艺术地再现台湾现代史的李乔——扛大旗的陈
映真——黄春明和王祯和的小说——杨青矗和王拓
的小说——新诗的发展——吴晟、蒋勋、许达然、
非马的诗——高山族民谣——白先勇、陈若曦、七
等生等新近的小说——聂华苓和於梨华新近的小说
——叶维廉、杨牧、张错、苏绍连、罗青等的诗——
余光中的诗和散文近作

第六章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台湾文学(下)

(1966—1980) (300)

张晓风、杨牧、许达然等的散文——姚一苇、马森、
张晓风等的戏剧——电影文学的兴盛——宋泽莱、
洪醒夫、曾心仪的小说——各具风采的青年女作家
李昂、三毛、席慕蓉——琼瑶的言情小说和古龙的武
侠小说——科幻小说的发展——儿童文学的成就
——留学生作家丛甦、张系国、施叔青

第七章 八十年代台湾文学(1980—1988) (361)

多元化的文学发展态势——施明正、陈映真等的政

治小说——以都市生活为主的现实题材作品——纪实文学发展趋向——怀乡思亲谱新篇——黄凡、廖雷夫等新生代作家崛起——新女性主义文学——表现手法多样化的趋向——诗坛景观

后 记(389)